

# 权威与个人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 权威与个人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储智勇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威与个人/(英)罗素著;储智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947-2

I. 权… II. ①罗… ②储… III. 哲学理论—英国—现代  
IV. 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72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QUÁNWĒI YŪ GÈRÉN

权威与个人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储智勇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947-2

---

2010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

定价:10.00元

# 目 录

卷首语·····	1
导言·····	2
第一讲 社会凝聚力与人性·····	13
第二讲 社会凝聚力与政府·····	25
第三讲 个性的作用·····	38
第四讲 技术与人性的冲突·····	52
第五讲 控制与主动性:它们各自的领域·····	71
第六讲 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	86
罗素作品译名对照表·····	101
译名对照表·····	103
译后记·····	107

## 卷首语

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不仅在细节方面，而且在总体的观念以及把它们应用于当前的境况方面，我一直得到我的妻子帕特丽夏·罗素的至关重要的帮助。

## 导 言

在将近 50 年的岁月里，<sup>①</sup>里斯讲座在现代英国文化生活中一直享有独特的地位。讲座按照惯例在深秋和初冬时节举办，它们是向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负责人约翰·里斯<sup>②</sup>表示敬意。里斯傲慢、专横、具有报复心，是一个专制的管理者和让人畏惧的人物，他既极大地挫伤过下属以及主管们的情感，又非常成功地创立了英国最令人赞赏和最持久的机构之一。里斯坚持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应让它的听众享受到最杰出的演讲者对最广泛的主题所做的论述。里斯讲座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上述主张，其挑选演讲者的标准始终是，他们兴趣广泛，精通自己讲述的论题，以及能够不费力气地使困难的论题对广大听众变得易于理解。因此，从 1948 年起，英国公众得以受到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天文学家 and 外交家、艺术史家和经济学家、神学家和企业巨头们的启迪。

里斯讲座要成为一项非常持久的事业，这无疑是讲座的创办者英国广播公司董事会的雄心所在——即便老实说，这并不是它的期望。对董事会来说，在战后调整时期艰难的早期岁月

---

① 这个导言写于 1995 年，距里斯讲座开办已近 50 年。——译注

② 约翰·里斯(1889—1971)，1922 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经理，1927—1938 年任董事长。——译注

里,创办这一讲座并不仅仅是为了向里斯致敬,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对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的理解,这是一个由工党政府和原子能、欧洲复兴和超级大国竞赛、帝国主义挑战和经济衰退构成的世界。他们雄心勃勃,确实想创办一个一年举办一次的广播版的吉福德讲座<sup>①</sup>——一个由英国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最有创造力的研究者主持的、面向广大听众的、通俗易懂的讲座。为了进行首场该系列讲座,并由此不但定下讲座的调子,而且确立讲座的信誉,董事会邀请了英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伯特兰·罗素。

20世纪英国文化和思想精英所宠爱的这样一种地位,既令罗素感到愉快,同时也使他感到新奇。在罗素特别漫长的一生中,其学术、政治和个人声誉一直都(并且将继续)剧烈起伏,而紧随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个10年,是他具有公共威望的少有的时期。1872年,罗素生于一个非常显赫而且稳定的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在大战爆发前的20年里,他就已经获得了思想上的声望。在剑桥专门为他设立的逻辑学和数学哲学讲席上,他有着20年不间断的思想成就。其间罗素的著作包括《论几何学基础》(1897)、《对莱布尼兹哲学的批评性解释》(1900)、《数学的原理》(1903)、《哲学问题》(1912)、《数学原理》(3卷本,1910—1913),以及超过30篇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仅是一位拥有罕见的复杂技术以及甚至更罕见的文体鉴赏力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逻辑学家,而且是一项新的并且强有力的思想推理技术——分析哲

<sup>①</sup> 吉福德讲座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神学讲座。——译注

学——的主要倡导者。一战前夕，罗素确实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英语世界上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然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罗素的生活；如果说他的哲学著作给他带来了名望的话，大战则使他声名狼藉。尽管罗素从来不是一个典型的远离尘世的剑桥教书匠——他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运动以及始于1907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都很活跃，并且在1910年发起了一场不成功的议会竞选运动——但罗素依然不是一个公共人物。然而随着1914年夏英国不屈不挠地迈向战争，罗素首先投身于中立运动，随后则致力于反战运动——演讲、写作、组织协调和出谋划策。罗素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坚信，这场战争——而不是所有的战争——是一个错误；确实，这场战争冒犯了他所有的政治直觉和道德原则。随着战争深入，英国的参与扩展了，罗素的反对也加深了，他反对粗鲁地对待有良知的反战者，反对压制公民的自由权，也反对英国指挥官的铺张浪费。这一反对是尖锐的、不屈不挠的，也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是罗素生命中独特的经历；不但各方面都情绪激愤，罗素因此而疏远了朋友，惹恼了同盟者，也激怒了当局，而且他意识到，战争确实受到了他的绝大多数同胞的支持，这使他震惊并感到迷惑。解释战争何以被接受——说明英国公众的好战和仇外，并探究他们为什么容易受到新闻巨头夸大宣传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政府集权趋势的漠不关心——在1918年以后的岁月里成了罗素核心的思想和政治工作。

两次大战间的年月由此目睹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罗素，他投身于一种非常不同的工作当中。由于自觉地决心成为20世纪的伏尔泰，罗素立刻——并且常常以一种很公开的方式——投



身到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种论题的讨论当中,努力重建社会和使个人重获新生,以避免再一次的军事灾难。演讲、写作、教书、旅行,罗素所派出来参战的并不是单个的探子,而是言语的大军——涉及政治理论[《自由之路》(1918)和《权力论》(1938)<sup>①</sup>],涉及经济变迁[《工业文明的前景》(1923)],涉及历史[《自由与组织 1814—1914》(1934)],涉及亚洲的未来[《中国问题》(1922)],涉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1920)],涉及教育[《论教育》(1926)以及《教育和社会秩序》(1932)],涉及婚姻和性[《婚姻与道德》(1929)],涉及数学[《数学哲学导论》(1919)],涉及法西斯主义[《用什么方法去争取和平?》(1936)],涉及科学[《原子初步》(1923),《伊卡罗斯》(1924)<sup>②</sup>以及《科学世界观》(1931)],涉及大众哲学[《心的分析》(1921)和《哲学概要》(1927)],以及涉及宗教[《我相信什么?》(1925)]。尽管其中的很多著作和大多数作为补充的文章生命力并不长久,这些作品依然影响了广泛的读者,并且进一步加剧了罗素的恶名;确实,尽管他关于宗教、伦理和性的开明观点吸引着年轻、独立自主和自由思考的人,它们却同时冒犯了闲适、因循和墨守成规的人。

二战爆发之际,罗素正在美国教书。他渴望回到英国,并参与到对他广受欢迎的作品的辩论之中,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却一直禁止他回国,政府实在太乐于记着他早期的反战观点和行为

---

① 全名为《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译注

② 全名为《伊卡罗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译注

了,却不相信他当前的——也是相当诚恳的——关于支持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斗争的声明。他由此在美国一直待到1944年夏天——写作,演讲,教书,并且为《西方哲学史》(1945)——这将成为他最广为阅读的作品——准备大量的手稿。

罗素后来不仅回到了英国,而且回到了剑桥,不仅回到了剑桥,而且回到了三一学院——19世纪90年代他曾是这里的一名大学生,20世纪头10年则是一名教师,1916年也正是在这里,他被不能容忍他的反战观点的大学董事会所驱逐。受他原来的大学朋友而现在是一三一学院院长 G. M. 特里维廉的邀请,罗素认可并且愉快地接受了提供给他的研究员职位,因为这是对先前那些不公正的一个纠正,也是对他持续作为20世纪一位杰出哲学家的一个证明。在盟军入侵法国的直接余波和打败德国的最后阶段回到英国,回到三一学院,回到牛顿所拥有的房间<sup>①</sup>,对于罗素意味颇多,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苦恼而悲观地离开了英国——对英国外交和防御政策的那些借口满怀愤怒,对国民政府在缓解弥漫性的社会和经济苦难方面的无能和不愿充满沮丧,并且对是否将他的孩子作为英国国民来抚养也犹豫不决。但是1944年,那一低迷、不真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紧接着的盟军的凯旋、工党的胜利以及《西方哲学史》在出版上的成功都一道振奋了罗素的精神,并且使他天生的适应力和

---

<sup>①</sup> 牛顿(1643—1727)1667年被选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罗素回到三一学院后,一直住在牛顿住过的房子里(参见[英]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三卷)》,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4页)。——译注

乐观主义迅速成长起来。

在三一学院，罗素受到了老朋友们和那些少数未服兵役的学生们的热烈欢迎。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紧接着的工党的胜利和《西方哲学史》的成功，罗素发现自己已经被人们当成是名人。学院当局并不指望他去教书或者作演讲，而罗素却以一个72岁老人令人惊讶的活力和热情投身到这两项工作当中。让他高兴的是，他赢得了那些机敏而有悟性的听众。伦理学、认识论和哲学基础等方面的导论性讲座课程，使剑桥最大的报告厅爆满。这些讲座的要点出自他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美国的讲座的汇编）。罗素的讲座是令人难忘的表演——深入浅出，机智诙谐，挖苦嘲讽，主题广泛，插科打诨，充满了活力，试图立刻迷住听众，也试图体现出哲学研究的道德严肃性和思想的高贵性。对他在剑桥的听众以及遍布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罗素——约翰·罗素勋爵的孙子，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教子——看来不仅很快和英国政治与文化的伟大传统建立了活生生的联系，而且也成为了战胜法西斯恶魔并粉碎了纳粹恐怖的西方文化的充分体现。罗素由此不被人们看作——他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只牛虻或者一个叛逆，反而被人们看作是为欢欣鼓舞的英国——她现在决心要在过去那些牢固而持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增光添彩的人。

对罗素的独特名望和他新的稳健风格的欣赏，很快就超越了剑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哲学史》不俗的销售业绩造成的——在经济短缺的英国，它的销量只是由于纸张的匮乏才受到了限制。罗素因此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英国议会以及外交部

所钟爱的一名演讲者(这对任何一个生活在 1916 年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接下来几年,在它们的要求下,罗素游历了瑞士、挪威、德国和法国,以便就“文化与国家”以及“伦理和权力”这样一些主题发表演讲。

正是在恢复了名望的背景下,英国广播公司发现了罗素。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社会绝对无法接受罗素,里斯和他的继任者也一直把罗素看作是一个充满极端观点的危险激进分子而加以回避。现在,罗素显然更温和也更值得信赖,于是 1944 年末,他受邀出现在大众智囊节目<sup>①</sup>中。他的出场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几乎立刻被邀请就“文明的未来”这一论题发表广播演讲,并在随后和 J. B. S. 霍尔丹、弗里德里克·科普斯顿等一些知名人士展开辩论。让英国广播公司的策划和导演高兴的是,罗素被证明是一个近乎模范的广播员——精确守时、见多识广、生动活泼、富煽动性却并不过激。到 1946 年底,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想要占有他,1947 年 1 月,罗素已抱怨操劳过度,“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极为喜欢我”。<sup>②</sup>正是出于他的声望——既包括演播室里的声望,也包括演播室外的声望——他被邀请作为里斯讲座的开幕演讲者。

从 1948 年节礼日<sup>③</sup>开始的连续几个星期天的晚上,讲座举行了 6 次,每次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些演讲完全是事先写好的,

---

① 英国广播公司 20 世纪 40 年代播出的、邀请专家组成座谈小组讨论时事问题的一个节目。——译注

② 引自罗纳德·W. 克拉克:《罗素传》(伦敦,1975 年版),第 496 页。——原注

③ 圣诞节的次日,这一天应送礼物给雇员。——译注

并以罗素有些尖利却极为清晰的嗓音发表出来,这些演讲都致力于同一个主题,即“把进步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个人主动性和生存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是否可能,关于这个主题,罗素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已经苦苦思考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罗素的演讲,既不是从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里所摘取的进度报告(就像 J. Z. 扬在 1950 年以及彼德·梅达瓦尔在 1959 年的演讲那样),也不是毕生学术或专业工作的最终陈述(就像伯纳德·洛福尔在 1958 年以及阿拉斯代尔·巴肯在 1973 年的演讲那样)。它们不如说是对个人与国家关系以及权力和权威在 20 世纪所采取的演化形式整整 40 年反思的产物。也就是说,罗素的讲座既没有对当前的研究进行总结,也没有提供新的结论或者展示新的研究思路。相反,这些讲座只是把他早期的思想精练了,把他在两次大战间的年月里探讨过的那些主题集中在了一起,反思了极权主义国家(既包括被打败的,也包括还存在的)的遗产,并解释了自由社会在 20 世纪剩下的年代里所面临的挑战。

就像罗素一开始在他的演讲里承认的那样,至少从 17 世纪起,国家权力(“权威”)和人类自由(“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问题就一直处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但是罗素 1948 年非常直截了当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广大公众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在英国本土,正如罗素的听众充分意识到的那样,1945 年艾德礼政府的上台,已经使英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进程——一个由国有化工业和教育改革、社会保险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组成的进程,这个进程逐渐导致了政府当局对英国社会几乎每个方面的全面扩张。这种扩张——对

于社会凝聚力、个体积极性以及个人责任——的含义恰恰处于激烈的，并且常常痛苦的全国性争论的中心，这一争论不仅涉及很多特殊立法项目的细节，而且涉及每个英国国民的价值观、行为以及期望。在英国之外，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体制在东欧的建立，同样激起了关于极权主义国家本质以及增长中的国家控制的危险的激烈讨论，其中阿瑟·科斯特勒、卡尔·波普和乔治·奥威尔对这一讨论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因此，在讨论“权威与个人”这一主题时，罗素不仅提供了他自己长期积累的思考成果，而且也加入了一场热情洋溢并且引人注目的、具有最广泛可能结果的讨论之中。

阅读《权威与个人》，可以发现罗素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条理清晰、富于才智、严谨而不阴沉，考虑的不是为世界政府、地方政府的改革或者为关于自由的各种宪章提供详尽的方案，而是要消除困惑以及清楚地阐明许多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精确的逻辑学家和有造诣的教师，罗素向我们说明了在得以明智地形成这样一些方案之前所必须追问的那些问题的性质。罗素由此带领他的读者穿越了诸如社会的形成和目的，正义的本质和功能，教育的范围和道德准则的演进，社会、经济和思想进步的机制等这样一些永恒并且也许带有根本性的论题。而且，他是着眼于当时的现实来这样做的：着眼于技术进步——这些技术进步既提高了国家监管和强制的能力，又缩减了个人抵御权力的能力，着眼于战争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错误的侵略会带来核末日，以及着眼于广告、宣传、媒体技术的创新——这些创新有可能削弱我们为自己着想的能力和愿望。在他第六讲的结尾，罗素由此为我们深

刻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挑战，严正地警告我们以其所有伪装而出现的权威所具有的无孔不入的力量，并再次令人鼓舞地重申，人类自由不仅本身就是目的，而且也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手段。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第一次里斯讲座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当然，约翰·里斯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讨好的人，他抱怨罗素讲得“太快了”，而且“嗓音也不好”。<sup>①</sup> 然而批评者和听众却给予了较多的赞扬。老朋友、原来的对手以及很多不知名的仰慕者给罗素写了大量信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同意 T. S. 艾略特的判断，即罗素是“能写英文散文的不多的在世作家之一”，并赞成《泰晤士报》的评价，即这一演讲标志着“广播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sup>②</sup> 1949 年暮春，当这些演讲稍作修改后的版本以《权威与个人》一书的形式出版时，它既赢得了批评性的赞许，也赢得了很大的销量，在一直持续到夏天的时间里，这本书每周的销量达到了 500 本。

正如这种有人发表批评意见但讲座受到广泛欢迎的令人满意的局面所清楚表明的，《权威与个人》这本小册子对于它的时代是及时而有力的，既证明了英国广播公司选择的正确性，也证

---

① 查尔斯·斯图亚特等：《里斯日记》（伦敦，1975 年版），第 464 页。——原注

② 艾略特 1949 年 6 月 10 日致罗素的信，载《罗素自传，1944—1967》（伦敦，1969 年版），第 52 页（中译参见[英]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三卷）》，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3 页）；《泰晤士报》的引语引自卡罗琳·摩尔海德：《伯特兰·罗素》（伦敦，1992 年版），第 460 页。——原注

实了罗素被重新发现的威望。此外,当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它对于权威的要求和自由的需要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所作的有力而详尽的阐述,反而增加了其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它的雄心而言,就它的分析所具有的智慧而言,以及就它的结论的启发性而言,《权威与个人》对我们仍然是雄辩而有说服力的。

柯克·威利斯

佐治亚大学



## 第一讲 社会凝聚力与人性

在这些演讲里，我打算考虑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进步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个人首创性和生存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我将从人性中的各种冲动入手，正是这些冲动使社会合作成为了可能。我首先考察这些冲动在非常原始的社会里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然后考察不断进步的文明中逐渐变化的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各种适应性。接下来，我将讨论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里社会凝聚力的范围和强度，它们导致了今天的社会以及这些社会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探讨了使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力量之后，我将着手讨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人首创性，说明它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它在今天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在个人或者群体中首创性过多或者过少的各种可能性。随后，我还将探讨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由现代技术所引发的在组织和人性之间的冲突，或者换一种说法，经济动机和创造以及占有冲动的分离。在论述了这一问题以后，我将考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最后，我将把个人的思想、努力以及想象力同社会权威之间的总体关系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思考。

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性动物中，合作与结群具有某